

我能期待什麼？

簡惠美「韋伯《宗教社會學論文集》提綱」

韋伯系列演講——

歷史所／鄒武霖

「你能訴說過去嗎？」

至少，這是當我成為書寫者，提筆試圖記述11月22日在圖書館一樓的簡惠美老師演講時，纏繞著大腦的焦慮向我提出的問題。「過去」早已逝去，正因為如此當人們藉由諸多方式（口述、書寫抑或圖像）將其再現的瞬間，勢必遭遇到不可避免的缺失與錯漏。不僅僅是聲音、文字或圖像作為方法的局限，「書寫者」的選擇、失憶與智能直接地決定這些方法能否達到重現的預期效果。「筆者」能否藉由拙劣的筆墨向讀者們描述那兩個半小時的劇情？我自己也仍抱持懷疑，只希望以下試圖重現過去的文字，多少能夠折射出某些真實。也在此前提下，選擇如此在開頭，向未能親耳聆聽的讀者們說明。



對筆者而言，這是第一次聽簡惠美老師的演講，之前僅知簡老師翻譯一系列韋伯的相關著作。第一印象其實來自於簡老師的聲音，更精確地說是談吐間的音調與旋律，彷彿陰陽頓挫之間每個音節踩在過往記憶的音符上，像是快跌倒的

樣子。不知為何，只是這種感覺，總讓人覺得話語節奏中滲透出某個……故事。就一位聽眾而言，如此的語調氛圍彷彿也說明本次演講的主題：「我能期待什麼？」

一開始，簡老師直言自身譯出《韋伯學思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之後，已經與韋伯分開一段時間，近年從存在主義轉向投身美學（如歌德、康德等人）的研究。她認為韋伯是一位全心全意投入學術研究的學者，只是這位聰明絕頂的人為我們找到脈絡的發展與問題，卻無法指出一個解決的方法。學術成為一種「志業」，但「學術有沒有價值成為人的志業？」。在韋伯晚年的〈中間考察〉此篇文章中，透露出韋伯對於「現代文化人」的處境感到十分絕望，即便「實踐生命，也不能保證生命的意義」。其實，韋伯的哲學與其社會學理論難以找到生命的「希望」，因此簡老師在「美」的存在和意義中找到另一條路徑。這是由康德對理性「三大問」點亮的工具概念：「我們知道什麼？」、「我們應該做什麼？」以及「我們能指望什麼？」。希望在美學之中尋求人為何能活著並繼續邁進的動力……

很快的，簡老師暫且打住康德的問題，稍微介紹《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內容與結構。此書是集合韋伯晚年致力世界諸宗教經濟倫理的深刻研究，這些宗教包含：儒教、印度教、基督教、古猶太教以及未來得及成書的伊斯蘭教。韋伯考察出發點來自於：「在過去、在世界任何地區，構成人類生活態度最重要因素之一者，乃巫術與宗教的力量，以及奠基於對這些力量之信仰而來的倫理義務的觀念」，宗教解釋並提供

「人如何面對這個世界」以及「人如何面對自己」的意義和價值，因此宗教倫理的要求（即生活支配性）即是規範生活如何「合理」安排的邏輯與價值觀，韋伯所論述西方理性化的核心要素「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即是如此，他解釋為何這樣的「理性」（禁慾、勞動與志業）成為我們所認知的「理性」。

仍有個問題，為何只有西方的文化土壤中茁壯出那種「資本主義精神」，並且長成足以撼動並改變整個世界的力量？對韋伯的世界諸宗教研究，一方面可重新檢視基督新教以外的宗教，其物質環境對於宗教信仰與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間接地肯定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僅只有西方文明足以產生這樣理性化的經濟體系與其道德價值¹（仍得注意，兩者並非是機械性一般的因果關係）。筆者粗淺地理解，這種「理性」並非判斷「好」或「壞」的道德準則，而是一種概念工具，得在特定歷史文化（如資本主義精神）的脈絡之下才能得到「首尾一貫」的解釋。但，韋伯卻在他的〈中間考察〉指出「理性化」的追求越大，製造出更加深刻與尖銳的緊張關係也越是劇烈，如此針鋒相對的衝突也正是簡惠美老師所著眼的問題。

1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韋伯選集（Ⅱ）：宗教與世界》（臺北：遠流出版事業，1990），〈導言〉，頁30-33。

〈中間考察：宗教拒世的階段與方向〉，是韋伯在1915年11月在〈導言〉與〈儒教與道教〉之後緊接著發表的文章，為的是先寫下「世界諸宗教之經濟倫理」這個主題的初步結論，並進一步提出要分析的問題。²簡老師認為，〈中間考察〉是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中最核心的一篇文章，也呼應了那兩篇著名的演講。他揭示宗教的救贖及禁慾隱含的「拒世」心態，一旦發展成倫理之際，「當宗教越是從儀式主義昇華為『心智的（或信念的）宗教意識』之時，緊張性就越劇烈。」³我們該如何理解這樣的「緊張性」呢？若按中譯本的章節排序，「宗教的拒世」展現在幾個面向：經濟、政治、審美、性愛與知性等領域，而簡老師透過韋伯所敘述「性愛」與「理性化」最強烈也許亦是最根本的矛盾，勾勒出「現代文化人」所面對的困境與難題。

「戀愛」，中古時是反映在騎士之愛對於女性的一種封臣式戀愛服侍。戀愛的特有感情性格，隨著文藝復興的沙龍文化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這個時代拋棄了基督教式、騎士風尚的禁慾作風。但進入到啟蒙時期，戀愛領域邁向自主意

識與靈肉合一的階段，但與此同時「理性化」禁慾與現世的拒斥，「性關係」在兩者之間被迫重新詮釋。簡老師認為韋伯給予戀愛一個充滿美感的說法：「戀愛關係似乎是提供了愛的追尋之最高實現——亦即人與人的靈魂之直接交融——的保證。」她直接引述韋伯所描繪出戀愛與理性之間的根本矛盾的論述：

這裡頭所展現的，是一個具體的個人竟然會如此非理性的對另一個具體的個人（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奉獻之無可替代的意義。然而，就戀愛觀點視之，此一意義及關係本身隨此而來的價值內容，實奠基於形成一共同體——感覺完全一體化，「你」消融於其中——的可能性。……戀愛的人感受到自己已根植於用任何理性的努力都永遠無法到達的真實生命之核心，也明白自身已自理性秩序之冰冷無血肉得手中、自日常性的無謂陳腐之中完全逃脫了出來。⁴

人對於人之間在靈魂上的衝動與相合，在「理性化」世界中能被接受的情況，唯有在理性規制下的婚姻關係。然而，戀愛的轉化也發生在此，婚姻關係與彼此負有責任倫理的想法相連結

2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韋伯選集（Ⅱ）：宗教與世界》，〈中間考察〉，頁101。

3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韋伯選集（Ⅱ）：宗教與世界》，〈中間考察〉，頁109。

4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韋伯選集（Ⅱ）：宗教與世界》，頁133-134。

時，將責任意識的愛情貫注於有機生活過程之一切細節中，「一直到風燭殘年餘音嫋嫋為止」。

演講結束約莫九點，但人與「理性化」的矛盾似乎一直都在。筆者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韋伯觀察到當時代人們生活背後的精神意義與價值觀，新教倫理所衍生出的「理性化」——救贖、禁慾和勞動——，成為對自己與他人而言「為何人們這樣活著」的解釋。筆者閱讀韋伯的感覺，認為他極度地有意識並小心謹慎地處理模型與歷史之間的落差和有效性，如他是以社會中極端的「典型」（ideal type）探討某一種特質的意義與位置，而非何種平均值或特質的代表性。可怕的是，一百年之後在地球的另一端，似乎這些極端值在這個時代大道橫行，「活著」為了財富的累積與職業成功與否的追求，誰是約翰·高爾特？筆者回想起某位大猩猩似乎曾這樣說：「人懂得生存，卻不懂得生活，因此人們需要先知指導他們。」伏首膜拜自己樹立的雕像，然後被那冰冷的陰影壓垮。人們總是需要相信什麼，這樣才能夠在人們問起所謂的「生活」時，答出自身活著背後的意義、回應著自身一次又一次對自己審問的問題：「我該怎麼活？」或是「人該怎麼活？」

「我能指望什麼？」對簡老師而言是「美學」，而非「薛西佛斯神話」。只是對於筆者而言，理解「美」需要相當天賦與領悟，美的感覺也必須從各種面向上逐漸培養而成。相對於此，無止盡地滾石頭比較能夠說明那種感覺——某種「嘔吐感」——生活成為日常、日常成為生命的反胃。活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和平，奢侈地、幸福地感受到這種嘔吐感，若因此對生命本身有所質疑或否定，便可能遭受到側目與嘲諷甚至成為最差勁的人也說不定吧！

為撰寫此篇小文，筆者努力閱讀了〈中間考察〉，著實難以自稱理解韋伯縝密的思維與推論，但的確從中深獲啟發並感受到「我能期待什麼？」此提問背後的意涵。若讀者有感於「理性」的矛盾或「感性」的質疑，其實沒有也沒關係（笑），都十分推薦你們這篇〈中間考察〉，也許能為你們的疑惑提供一條思路與方向。

